发展中国家政治与对外关系  
**Politics and External Relations of the Developing Countries**

**授课教师**俞沂暄 讲师（[yuyixuan@fudan.edu.cn](mailto:yuyixuan@fudan.edu.cn)）

**助教**朱定泽

**目录**

[第一讲 研究发展中国家的视角 3](#_Toc194565617)

[一、发展中国家的相关概念 3](#_Toc194565618)

[（一）用于指代发展中国家的各类概念 3](#_Toc194565619)

[（二）“第三世界” 3](#_Toc194565620)

[二、经济学视野中的发展中国家（第三世界） 4](#_Toc194565621)

[（一）发展中国家的共同特点 4](#_Toc194565622)

[（二）关于第三世界经济发展的理论 4](#_Toc194565623)

[（三）20世纪80年代后的发展中国家经济 6](#_Toc194565624)

[三、政治学视野中的发展中国家 8](#_Toc194565625)

[（一）对发展中国家的学术兴趣 8](#_Toc194565626)

[（二）政治发展的观点：发展主义 8](#_Toc194565627)

[（三）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制度 9](#_Toc194565628)

[四、关注的问题 10](#_Toc194565629)

[第二讲 二战后的第三世界 11](#_Toc194565630)

[一、第三世界的独立发展道路及其挫折 11](#_Toc194565631)

[（一）独立早期领导人的“中间道路”取向 11](#_Toc194565632)

[（二）“中间道路”的三种结局 11](#_Toc194565633)

[（三）第三世界的合作受挫 11](#_Toc194565634)

[二、冷战后发展中国家国内政治变化 11](#_Toc194565635)

[（一）“民主化” 11](#_Toc194565636)

[（二）南非结束种族隔离政权 12](#_Toc194565637)

[（三）也门统一与动乱 12](#_Toc194565638)

[（四）索马里和卢旺达 12](#_Toc194565639)

[（五）南苏丹独立 12](#_Toc194565640)

[三、冷战后发展中国家经济变化 13](#_Toc194565641)

[（一）经济起伏 13](#_Toc194565642)

[（二）国际经济问题 13](#_Toc194565643)

[第三讲 阿根廷 14](#_Toc194565644)

[一、阿根廷概况 14](#_Toc194565645)

[二、阿根廷历史 14](#_Toc194565646)

[（一）殖民者与考迪罗 14](#_Toc194565647)

[（二）现代政党体制与军政府 15](#_Toc194565648)

[三、阿根廷基本政治制度 15](#_Toc194565649)

[四、阿根廷的主要问题 15](#_Toc194565650)

[（一）经济为什么在20世纪走入下滑通道 15](#_Toc194565651)

[（二）是否形成了稳定的政治 16](#_Toc194565652)

[（三）军队的角色 17](#_Toc194565653)

第一讲 研究发展中国家的视角

2025.2.20 / 2025.2.27 / 2025.3.6 / 2025.3.13

一、发展中国家的相关概念

（一）用于指代发展中国家的各类概念

“第三世界国家”“发展中国家”“欠发达国家”“不发达国家”“南方国家/全球南方”“新兴民族国家”……这些概念都或多或少与发展中国家相关。

“全球南方（global south）”是近年来兴起的一个概念，来源于“南方国家”；而“南方”的称呼又来自于上世纪60~70年代对世界“东西南北”的划分，因为南半球多为发展中国家而北半球多为发达国家，所以发展中国家被称为“南方”。时至今日，与“南方国家”相对的是以七国集团（G7）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在某种意义上也是西方世界。

“欠发达国家（under-developed country）”最初被西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家使用，“不发达国家（un-developed country）”起初则与发展中国家的概念近乎全同。在当今的政治界与学术界，这两个概念已较为少用。

“新兴民族国家”是新中国建立之初在外交场域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从殖民地、半殖民地独立的国家的称呼，在当时与“第三世界国家”“发展中国家”意义一致。

可见，在上述这些术语之中，有些术语是纯描述性的，而另一些术语则具有政治意味。

（二）“第三世界”

1. “三个世界”及其划分

“第三世界国家”是较为常用的指代发展中国家的术语。最早提出“第三世界”概念的是法国人口统计学和经济史学家阿尔弗雷德·索维（Alfred Sauvy），他以法国历史上的“三级制”为灵感，于1952年提出了“三个世界”：

* **第一世界：**工业化资本主义国家；
* **第二世界：**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
* **第三世界：**上述两类之外的国家。

由此可见，在索维的定义中，第三世界的特征是没有经过工业化且不是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也意味着，索维认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都可以实现工业化。在这种划分中，中国应当属于“第二世界”；但也应当注意，当时的索维在定义“三个世界”时，对“第二世界”的定义多是参照苏联制定的，可能并未考虑中国。

我们更为熟悉的是毛泽东于1974年提出的“三个世界”划分的思想：

* **第一世界：**美苏；
* **第二世界：**东西欧以及其他工业化国家；
* **第三世界：**其他国家，即整个亚非拉（除了日本）。

毛泽东对“三个世界”的划分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也对日后中国的外交产生了深远影响。毛泽东如此划分的根据可以概括为：第一世界既富且强（核武器储量高、打击能力强），第二世界较富较强，第三世界既穷且弱。

2. 冷战之中与之后的第三世界

“发展中国家”的概念在1964年由77国集团在联合国第一届贸发会议上提出。冷战时期，“第三世界”和“发展中国家”经常作为同义词使用。冷战时期第三世界的标志性事件、组织包括1955年亚非会议、不结盟运动、77国集团等。

冷战后，第三世界经济发展水平出现了较大的分化。世界政治两极结构结束后，不依附于两大集团的不结盟运动的意义大大降低。第三世界国家开始重新寻找自己的立场，共同的政治立场也不复存在。第三世界国家普遍接受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观念，在发展途径上与西方趋同，失去了原有的第三条道路或立场的独立地位。可以说，冷战后的“第一世界”“第二世界”已面目全非——按索维的定义，第二世界已然消失；按毛泽东的划分，世界战略图景也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因而，“第三世界”也失去了自己存在的基础。

冷战后，“第三世界”的称呼逐渐转变为“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的核心关切是经济发展，而其经济发展水平分化严重，出现了新兴发展中大国（新兴经济体）与最不发达国家之分。

二、经济学视野中的发展中国家（第三世界）

（一）发展中国家的共同特点

从经济学视角来看，发展中国家具有以下共同特点：

* 低生活水平
  + 人均国民收入或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低
  + 贫富差距极大
  + 赤贫人口（即极端贫困人口，按世行标准为每人每日生活费不超过1.9美元）多
  + 预期寿命低、婴儿死亡率高
  + 人口受教育程度低
* 人口出生率高
* 失业率高
* 依靠农业和初级产品生产和出口

（二）关于第三世界经济发展的理论

发展经济学关注发展中国家如何达到发达国家的经济水平。为了回答这一问题，发展经济学也产生了诸多理论。

1. 线性发展理论

美国经济学家沃尔特·罗斯托在《经济成长的阶段——非共产党宣言》中提出了经济增长阶段理论。这一理论认为，经济增长有一种线性的规律，这一规律已被包括英美在内的诸多西欧、北美国家验证，因而马克思提出的经济发展规律是非正确的。经济增长阶段理论可以被视作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发展的表象的总结，其中包括以下阶段：

* 传统社会
* 起飞前阶段
* 起飞阶段
* 成熟阶段
* 高消费阶段

罗斯托指出，经济的起飞必须要有农业生产率的提高。（传统）农业与工业的最大区别在于，第一，农业“靠天吃饭”，以气候为主的自然因素为农业生产带来了相当的不确定性；第二，传统社会中农民依靠自有的生产资料进行生产，而工业社会中生产资料为资本家所有。因此，只有农业生产率提高了，社会的经济总剩余才会提高，才有资金进行投资，为工业化积累资本；工业化逐步发展后，随着农业人口变为工业人口，工业生产率提高，经济就逐渐走向起飞了。

虽然作为一个封闭的抽象模型而言，罗斯托的理论揭示了较为正确的规律（尤其是农业生产率提高的重要性），但其实践意义非常有限——例如，虽然罗斯托指出了农业生产率要提高，但没能揭示传统农业如何产生剩余；事实上，传统的小农经济自给自足，是很难产生剩余的。我们可以看到，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积累也显然不是通过农业剩余实现的。人类历史至今唯一能通过传统农业产生剩余从而走上工业化道路的，只有20世纪的一些社会主义国家；这些国家的这一过程也并非罗斯托主张的“自然的”经济增长阶段，而是受国家高组织化强烈干预的结果。此类国家的典例就是中国，而中国又有其特殊条件，如中国悠久的农业传统与水利积淀。

2. 新古典主义理论

刘易斯提出了二元经济模型。所谓“二元经济”，就是两个经济部门大类：一个是传统的、人口过剩的农业部门，边际生产率为零；另一个是劳动生产率较高的现代城市产业部门，工资水平高于农村平均收入，充分就业。那么，一边是人口过剩，另一边是充分就业，就会导致农村剩余劳动力转入城市；达到农村产出边际生产率不再为零时，完成经济结构转型。

刘易斯的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数学经济模型，因而忽略了一些因素：例如，城市产业部门从何而来？即使将这一点作为默认条件，也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城市产业部门如何能保证持续的充分就业，从而吸引农业人口涌入城市？换言之，就是城市产业部门如何扩大再生产的问题。

要扩大再生产，资产者不能将利润用来消费，而是用来投资；要扩大再生产，需要对一些基础产业（如基础设施）进行投资，但这种投资的见效更慢，因而不为资产者所欢迎，导致经济发展不可持续。这些规律是新古典主义理论所没有提及的。

3. 普雷维什的进口替代模式

普雷维什进口替代模式的理论基础是“中心-外围”理论，即结构主义这一在批判新古典主义之上形成的流派。普雷维什认为，新古典主义理论只能适用于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但发展中国家往往没有这样的市场。因此，要首先解决结构问题，即解决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恶化的问题——发达国家以低价进口发展中国家的农产品，发展中国家则以高价进口发达国家的工业品。

普雷维什认为，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的恶化源于历史。要打破这种恶化，就需要打破“外围”对“中心”依附的结构制约——进口替代，以自行生产替代进口。

在实践上，多数发展中国家都执行过进口替代。进口替代可以说是一个必经的阶段，但除了一些东亚国家之外，大多数实行进口替代的国家（尤其是在拉美和非洲）都失败了，失败的标志就是20世纪70年代末发展中世界陷入的债务危机。它们之所以陷入债务危机，在于低竞争力的产业加上高关税的贸易保护的不合理匹配；此外，进口替代一般由国家大力支持，投入巨大资源，导致大量人员涌入进口替代的产业，形成冗员，加大成本。工业生产的复杂性也是原因之一，资本、技术等流程之间无法打通，就需要进口，进口依赖硬通货，硬通货不能依赖低竞争力的工业品，于是只能依赖其出口农产品和原材料——但是，国家大力发展工业，又已经忽视了农业，农产品的出口无法满足需求，所以只能举债；这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20世纪80年代初，里根政府下的美联储宣布加息，发展中国家发现它们已无法还清债务，债务危机由此爆发。

进口替代理论在理论上相比线性发展理论和新古典主义理论有了一定进步，但在实践上遭遇了重大挫折。当然，进口替代理论虽有问题，但“进口替代”作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一个过程，仍有其不可替代的意义。

4. 新马克思主义

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代表是阿明的依附型经济理论。阿明指出，依附型经济不是一个国家的国民经济简单地依附于另一个国家的国民经济，因为外围国家的生产和消费、资本和劳动等都分散在各个外向型部门里，不能作为一个有机整体的国民经济看待。外围国家经济的各个部门分别和世界经济的某些分支联系在一起，而相互之间却是分割的，在国家层面无法形成统一的经济合力。依赖外国投资和援助使得本国经济和社会结构有利于跨国公司谋取利益，加剧了国内的分化，加深了依附地位。

针对此类依附型经济，阿明难以提出一个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他唯一提出的方案“孤立”，在实践上也较难落实。

5. 发展经济学的困境

20世纪70年代末，上述理论乃至整个发展经济学都陷入困境，因为理论无法回应70年代开始第三世界国家经济发展的诸多问题和困境。从此，新自由主义重新夺回对世界经济、第三世界发展问题解释的主导权。

（三）20世纪80年代后的发展中国家经济

1. 新自由主义影响下的发展中国家经济

相对于20世纪80年代前发展中国家主要采用的结构主义路线，新自由主义更加强调按市场规律发展经济。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新自由主义为发展中国家解决的首要问题，就是解决债务危机，避免迫在眉睫的破产。

80~90年代发展中国家按新自由主义进行的“结构调整”，其总体思路是以成熟的市场经济为参照系。1981年，世界银行发布了《伯格报告》，即《撒哈拉以南非洲加速发展的行动纲领》。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大部分接受《伯格报告》，但迎来了失败的结局——“掉进了深井”：低投资、失业增加、社会福利削减、消费减少、生产下降的恶性循环。这是因为，新自由主义要求发展中国家严格财政纪律，减少财政支出，这导致了投资减少，原有的产业也难以维持，失业于是增加，福利于是削减，消费也随之减少。可以说，新自由主义政策彻底摧毁了这些发展中国家本就脆弱的经济结构；直到21世纪，这些国家的经济才有所回升。

2. 对东亚经济成功的研究——制度主义

在发展中世界的经济大多陷入困境时，东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却取得了相对的成功。基于对东亚（不包括中国）研究的制度主义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面临诸多外部约束，但倘若一国的政策足够有力，就能够抗衡这些外部约束。当然，此类抗衡不是无条件的，其前提是强有力的政府、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有效联系。

要建设强有力的政府，就需要一场政治社会变革，就要求没有强有力的政治经济集团影响政府的权威和权力，其中前者在东亚国家就主要指大土地所有者；而东亚国家（及地区）（以“亚洲四小龙”为代表）都进行过土地改革，破除了大土地所有者的地位，解放了农民的人身依附。此外，东亚的中央集权的传统也在其中提供了助力。要建设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有效联系，就需要在社会变革之中建立良好的制度，调整产业界与政界的关系。

在确保了强有力的政府、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有效联系后，就要出台合适的产业政策，在一段时期的进口替代后，及时转向出口导向。出口导向是东亚国家经济腾飞的关键。出口导向产业大多为发达国家转移而来的产业，面向的市场则是已有的国际市场，产业具有竞争力，能够产生相当的利润，由此就能吸引投资，扩大再生产，形成良性循环。在这一过程中，国家还会调整产业政策，开拓新产业，推动产业升级。

也有一些制度主义学者指出，东亚经济腾飞还有一个辅助条件，即国际契机。例如，日、韩由于处于冷战的前线，因而受到了美国的大力援助。中国把握的国际契机则是20世纪70年代末之后的发达国家产业转移浪潮，以及冷战结束后经济全球化的浪潮。

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是，“国际契机”只是一个“辅助条件”吗？讲师认为，在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外部因素的重要性远超内部因素。发展中国家所处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其源头来自外部；发展中国家经济在20世纪80年代初陷入的债务危机，其直接原因是美联储加息；日、韩等国的成功之中，美国扮演的角色被严重低估了。因此，没有国际契机，发展中国家是难以发展其经济的。

3. 林毅夫的新结构主义经济学

林毅夫的新结构主义经济学同样是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经济成功的解释。“新结构主义”对应的是“旧结构主义”，如普雷维什的政府主导进口替代思想。新结构主义承认发展中国家经济结构的落后与经济环境的不利，但其认为仅靠政府克服市场失灵的不行的，因为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往往没有那样的治理效能；因此，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参照系应当是市场，由市场的信号告诉政府其比较优势，从而激活要素禀赋。

虽然都强调市场，但与新古典主义不同的是，新结构主义强调市场体系是需要培育的，而这个培育的工作就有赖于政府。政府还需要解决一些企业无法解决的问题，即外部性，如基础设施、物流、能源、电力等；此外，政府还要塑造良好的市场软环境，如推行税收优惠政策等。当然，对于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来说，在全国范围内进行这些建设、执行这些政策是困难的，因此可以在局部予以落实，设立工业园区、经济特区。

新结构主义经济学没有特别强调国际性的因素，避免了制度主义的“产业转移论”中产业转移被人为限制的可能性。

总之，新结构主义经济学的逻辑是：不同发展程度国家的要素禀赋是内生的、变动的，但是每一个特定时间点的要素禀赋是确定的；政府要做的就是帮助市场确定要素禀赋。有效的市场能够形成反映要素稀缺性的灵敏的价格体系，引导企业按比较优势选择产业，从而形成竞争优势。竞争优势带来利润，形成资本积累，有竞争力的企业进一步发展壮大，形成良性循环。

4. 格申克龙关于落后国家工业化的观点

格申克龙提出了落后国家工业化的“后发优势”。他指出，落后国家工业化可以应用最先进的技术，而较先进的国家可能由于惯性，或者由于改变原有生产布局的成本，反而在技术更新方面犹豫不决；落后国家工业化倾向于大规模工厂的建设和生产资料生产；落后国家工业化是对先进国家的模仿，但模仿中伴随的决定性要素来自本土。

需要注意的是，后发优势是有前提的。格申克龙的主要理论发表于20世纪中叶，在此处提及的“落后国家”是法国、德国等欧陆国家，它们相对于英国在工业上是有代差的，但这一差距并非很大。可见，后发优势的前提是：第一，先发国家与后发国家之间的差距相对有限；第二，后发优势是相对于某个国家的，如明治维新后日本相对于普鲁士的后发优势、二战后的德国相对于英国的后发优势。由此可见，格申克龙的理论有严格的限制条件，也因此难以广泛适用于当今的发展中国家；对于现在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后发优势理论的应用之处往往在于某个特定的产业的发展。

纵观以上理论，讲师认为，其共有的不足在于对国际因素的忽视。在东亚经济崛起的典例中，美国在冷战前中期采取的政策对日、韩，乃至中国台湾的经济发展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冷战结束后，东亚、东南亚的国际政治安全环境较为良好，因此诸多发展中国家得以抓住发展的契机；此外，在上述过程中，先进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限制措施也较少。国际环境对发展中国家的重要性还在于，发展中国家缺乏资金，而只有一个对其友好的国际环境才能为其提供有利的发展资金。

以上理论还共同揭示了一点：发展中国家要经济发展，就必须要工业化。正如“农业剩余论”中提及的传统农业与工业的不同所指出的那样，传统农业极大地限制了一国经济发展的上限，工业能够解除这一上限。工业化的道路，总的来说也可分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前者能自行地产生农业剩余，后者则主要不是依靠本国的农业剩余。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特征是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分离，而这也是现代生产方式的基本特征，即社会化大生产；理论上，社会主义在社会化大生产的基础上，通过公有制回归了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结合。

因此，创造资本关系的过程，只能是劳动者和他的劳动条件的所有权分离的过程，这个过程一方面使社会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转化为资本，另一方面使直接生产者转化为雇佣工人。因此，所谓原始积累只不过是生产者和生产资料分离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所以表现为“原始的”，因为它形成资本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方式的前史。

——卡尔·马克思、弗雷德里希·恩格斯《资本论》

三、政治学视野中的发展中国家

（一）对发展中国家的学术兴趣

20世纪50年代，比较政治学开始转向关注第三世界的政治发展与民主化，这是因为当时涌现出了一批新的国家，西方从之前对殖民地历史文化的研究变为了对新兴国家政治的研究。

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关注则有三个渊源：第一，马克思主义传统对殖民地政治经济的研究；第二，改革开放后引进的美国的政治发展、比较政治学研究；第三，最初的国际政治分工研究。

（二）政治发展的观点：发展主义

1. 发展主义的内容

发展主义是西方对发展中国家政治发展的主要观点之一，其主要内容是：第三世界政治发展是经济发展的结果；在政治和经济发展的先后顺序上，经济发展是第一位的；经济发展-社会多元-政治民主是一个普遍的、相互协调的过程。持这一观点的代表人物有罗斯托、李普塞特等。

2. 对发展主义的批评

亨廷顿于1968年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对发展主义提出了批评。他认为，经济增长、社会变迁、政治发展/民主化在第三世界国家不会协调并进；很多第三世界国家在经济获得增长的同时，政治上反而更加动荡不安；各国政治最重要的分野，不在于政府的形式，而在于政府的有效程度。

3. 发展主义的回归

20世纪80至90年代出现了“第三波”“民主化”的浪潮，许多军人政权和“威权主义”政权和平转化为“民主”制度，从70年代中期的南欧开始，70年代末、80年代扩散到拉美，80年代后期扩散到东亚、苏东。在这一背景下，“政治民主”被再次强调，发展主义又回归了西方政治发展观点。

（三）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制度

1960年，阿尔蒙德在《发展中地区的政治》中，以结构功能主义而非传统的“地区性研究”为方法，根据政治结构行使政治功能的方式来比较各个政治体系。

欧美学术界对发展中国家政治制度的分类，主要有以下标准：军政府还是文人政府；政教分离的政府还是政教合一的政府；是否有政党之间的竞争性选举。这三个标准都涉及现代国家的问题：第一，现代政治中文武关系的核心是军队服从于政治意志，而非文官服从于武装力量的“军阀”；第二，现代国家是世俗化的；第三，现代国家是大众民主的国家，要参与政治只能通过政党竞选进行。

1. 民主模式

民主模式是二战结束至60年代初，独立后国家普遍采用的政治制度。其基本上模仿了西方的民主制形式：选举与多党制。但是，此类国家的经济发展的绩效如若不佳，就往往会转变为一党制或在60年代军事政变中垮台。

2. 精英-动员模式

精英-动员模式主要为革命后国家采用，要求具有通过革命树立起权威的政治领导人，以及具有能够动员民众的意识形态和比较强大的政党。这一模式通过政治经济变革实现快速发展、社会公平。典例有墨西哥、埃及、阿尔及利亚、坦桑尼亚等。

3. 官僚-权威模式

官僚-权威模式即所谓的“威权主义”，通常是重大危机的产物，表现为军人政权和一党制政权。奥唐奈尔总结了四点军人政权特征：

1. 以高度垄断化和跨国化的上层资产阶级为主要社会基础；
2. 致力于恢复社会秩序和稳定经济的官僚组成压制性的政权体制；
3. 上述两大集团组成排斥性政治体系，用严厉的控制手段清除先前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的民众阶层；
4. 经济上推行有利于私人寡头的资本积累模式，加剧社会资源分配的不平等。

这一模式广泛见于20世纪的拉丁美洲，但这一概念目前已经被滥用，偏离了其原有的界定。

4. 非洲的一党制政权

1952年至80年代末，非洲发生120多起军事政变，成功72起。70至80年代，非洲的多党制国家多改行一党制。80年代末，非洲51个独立国家中，实行多党民主制的只有博茨瓦纳、毛里求斯。南非是一个特例，其在白人范围内实行议会民主制。

非洲的一党制与拉美的官僚-权威模式有所不同：后者有强大的右翼统治集团，前者则没有；后者还有较为完备的政府效能，前者则同样没有。

5. 中东产油酋长国模式

中东的一些国家依靠石油获得高速经济增长，有着比较好的大众福利政策，保持了传统世袭结构和政治结构，传统世袭统治与官僚组织结合。

除了上述模式外，还有以伊朗为代表的现代政教合一模式。

总的来说，美国学者对第三世界政治的研究，有着明确的目标和取向：以西方发展经验为基础的政治制度——稳定的多党竞争选举制度。但是，正如同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史难以被线性发展理论所解释，实际上在更多地受到了外部影响，发达国家的政治也无法被这种“多党竞争选举制度”的参考系所完全解释。发达国家的政治之所以成熟，是因为它们有稳定的官僚制（行政体系）以及有限政府（即市场经济不受政府控制，仅由法治管控），但这两点在发展中国家都难以具备。

多党竞争意味着政党的存在，而政党的前提是从所有他赖以求助的共同体（如部落、家族、行会等）中脱离出来的个体化的人——在西方国家，最早出现的此类个体化的人是资产阶级，此时他们有公民权利（civil rights），却无政治权利。现代政党并未在资产阶级中出现，因为他们并未有迫切的组织需要；是当工人因高度集中且脱离共同体而需要组织时，才出现了现代政党。因此，是在第一个现代政党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出现后，资产阶级的政党才开始组织起来，争取政治权利（political rights）的斗争才开始。

由此，我们可见为何多党竞争未必适合发展中国家了：因为尚未形成成熟的市场经济，所以发展中国家的人尚未完全个体化，仍受部落、族群的限制；所形成的政党，多数也不过是前现代共同体的外壳罢了。

四、关注的问题

对发展中国家经济方面关注的领域是：发展中国家发展的核心要义是什么？

对发展中国家政治方面关注的领域是：发展中国家政治呈现多样性，这种多样性不是一种价值取向，而是一种事实，是研究发展中国家时需要承认并正视的。

第二讲 二战后的第三世界

2025.3.13 / 2025.3.20

一、第三世界的独立发展道路及其挫折

（一）独立早期领导人的“中间道路”取向

从二战结束到20世纪60年代，以恩克鲁玛、纳赛尔、苏加诺、尼赫鲁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领导人的政治取向是反抗殖民者，获得政治独立；加快发展，建立强大的新国家；没有特别模仿美苏任何一方的道路，而是走独立的“中间道路”，从而给自己更大的斡旋空间。当然，虽然没有刻意模仿，但苏联发展道路对它们的影响很大，这是由多种因素导致的：第一，它们反抗殖民者而独立，当时的殖民者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这些国家与苏联对抗，因而独立后就自然有靠近苏联的倾向；第二，要在短时间内完成工业化、建立强大的国家，苏联是当时罕见的可借鉴经验的案例。因此，尽管他们未必想要发展社会主义，但这些发展中国家领导人的经济政策大多是偏左翼的。

（二）“中间道路”的三种结局

随着冷战的发展，“中间道路”迎来了三种结局。第一种是（声称）朝“社会主义方向”转变，但在之后大多失败。第二种是转向西方式的发展路径，这可能是因为它们在现代化的过程中造成了传统社会无法承受的代价，又或者是将土地或产业激进地收归国有后经营不佳，当然在不少情况中也有美国干涉的成分。第三种是继续维持“中间道路”，如印度。

（三）第三世界的合作受挫

在独立之后，第三世界内部一度提出要合作，并采取了一些相应举措；但是，第三世界的合作没有什么显著的成果，甚至有一些合作是失败的。从政治上而言，第三世界国家分处不同的历史和政治经纬，政治合作有较大的难度，即使是“不结盟运动”在冷战后也逐渐失去了政治价值。从经济上而言，首先，发展中国家多是能源、原材料等初级产品的出口国，是工业品的进口国，因而发展中国家经济的互补性很小，这一情况直到中国崛起才有所改变；其次，国际金融机构由发达国家控制，发展中国家缺乏资本；此外，易货贸易的模式虽然能缓解硬通货问题，但也制约了经贸合作。

二、冷战后发展中国家国内政治变化

（一）“民主化”

1. 军人政权退出历史舞台

在军人政权集中的拉美与非洲，自80年代初起，多数军人政权开始和平地“还政于文人”。

在拉美，1980年，秘鲁恢复民选政府。1982年马岛战争失败后，阿根廷军政府倒台；1983年阿方辛民选政府上台。1983年，玻利维亚恢复民选政府。1984年，乌拉圭军政府“还政于文人”。1985年，巴西军政府终结。1989年，智利选举，基民党人获胜，次年恢复代议制政府；1998年皮诺切特交出军权，彻底完成民主过渡。1993年，巴拉圭经历30多年军政府统治后，重回文人政府。

在非洲，1998年，尼日利亚军政府还政于文人。

2. 一党制政权为多党制取代

在拉美，1990年，尼加拉瓜反对派联盟选举获胜，结束了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11年的执政；2000年，墨西哥反对党选举获胜，结束了革命制度党71年连续执政。

在非洲，贝宁、刚果（布）、加蓬、喀麦隆于1990年实行多党制；赞比亚于1990年恢复多党制；肯尼亚于1991年恢复多党制；加纳于1992年实行多党制；坦桑尼亚于1995年开始进行多党选举。在埃塞俄比亚，1991年推翻门格斯图政权，1995年进行多党选举。1992年，莫桑比克结束内战，实行多党制。2005年，乌干达实行多党制。至1989年，非洲绝大多数国家实行一党制或无党制，90年代中期，几乎所有国家都实行或恢复了多党制。

（二）南非结束种族隔离政权

1989年，弗雷德里克·德克勒克出任南非总统，取消对黑人解放组织禁令，释放纳尔逊·曼德拉。1994年，南非举行了不分种族的大选，非国大、南非共产党、南非工会联盟三方联盟获胜，曼德拉出任总统。

（三）也门统一与动乱

1990年，南北也门统一。1994年，也门爆发内战，南方社会党武装力量失败；萨利赫任总统，1999年、2006年两次连任。2011年，也门反政府力量要求萨利赫下台；11月，萨利赫移交权力，出国。2014年起，胡塞武装与政府军冲突。

（四）索马里和卢旺达

1. 索马里军阀混战

1991年，索马里巴雷政权被推翻，随即陷入内战。1992年，美国主导联合国维和部队进入。1994年，美军在遭到激烈抵抗后撤出；索马里持续军阀混战；军阀与伊斯兰法院联盟交战。2012年11月，索马里成立内战以来首个获得承认的政府，但反政府的伊斯兰极端组织仍在活动。

2. 卢旺达

卢旺达于1991年实行多党制。1994年，卢旺达发生了胡图人与图西人之间的种族屠杀。1994年，爱国阵线（流亡乌干达的图西族人组成）建立新政权，实行了和解政策，卢旺达开始稳定。2003年全民公决通过新宪法，2015年通过修正案。

（五）南苏丹独立

苏丹的南北部分在宗教信仰上存在较大差别：北部多为伊斯兰教，南部多为原始宗教及基督教。南苏丹受英国支持，寻求独立；苏丹于20世纪50年代末到1972年持续内战，战争的结果是南苏丹自治地位。在南苏丹发现石油后，由于利益争夺的白热化，苏丹政府希望将南苏丹自治地位取消，于是从1983年到2005年1月发生了第二次内战。2005年1月9日，内战双方签订《全面和平协议》：6年过渡期后，南部全民公决是否独立。2011年，南苏丹经全民公决独立。

三、冷战后发展中国家经济变化

（一）经济起伏

从20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世界经历着经济结构调整。这场以自由化为主要特点的调整，主要的举措包括针对国有资产的私有化，而私有化的目的是市场化，市场化又以自由化为前提，这是因为市场化迫切需要自由化提供不受干扰的市场信号。自由化，即经济自由流通，包含两方面：一是商品（经常项目与服务）的自由流通，二是资本的自由流通。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指出，私有企业面临着“硬约束”，只要赚取不到利润就面临着破产倒闭；国有企业则面临着“软约束”，即使经营不善也有政府兜底；因此，私有企业对市场信号要敏感得多。当然，这一理论未必完备，例如在20世纪末的金融危机中，一些私有大企业也得到了政府的帮助。

虽然从理论上来说，私有化、自由化的最终目的都是市场化；但是，在这段时期发展中国家（也包括一些发达国家，如英国）的实践中，却本末倒置了，私有化、自由化从条件（手段）成为了目的。

因债务危机，发展中国家大多在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自由化改革；为了借取外债，许多发展中国家不得不接受来自发达国家或国际组织的条件，其中最主要的条件就是自由化改革。自由化改革使得发展中世界在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遭遇了经济困难。

90年代中期后，发展中世界的经济恢复增长。21世纪头十年，经济恢复增长，一些国家增长速度较快；这些增长的原因是，经过了经济低谷的“大浪淘沙”后，留下的企业多是有一定竞争力的，为经济增长提供了较好的基础；此外，21世纪初能源、原材料价格飞涨，以此为主要出口产品的发展中国家从中受益。但是，金融危机之后，增长速度大幅下降，许多发展中国家也没有恢复之前的速度；新冠疫情更使发展中国家雪上加霜。

（二）国际经济问题

1. 国际经济新现象

冷战期间，以77国集团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呼吁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但是，随着自由化改革的进行，这种呼声也逐渐式微。冷战后，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取得了相对较好的经济发展成果。

20世纪70年代，7个世界上最发达的经济体组成了七国集团（G7），后来又形成了“G7+”模式，即邀请发展中国家参与对世界经济与发展问题的讨论；金融危机后，G7显然已无力处理世界经济问题，因此推动了20国集团（G20）的形成。G20原来是G7加上其挑选的一些发展中国家从而召开的部长级会议，是一个沟通平台；因为金融危机波及的范围大、影响深，所以在2008年，G20升级为首脑级会议，并于次年成为了讨论全球问题的平台，也是事实上协调国际经济秩序的重要平台。新冠疫情后，随着欧美政治经济政策调整，G20是否还能继续发挥这样的作用，还有待观察。

进入21世纪，西方国家希望将WTO“扔在一边”。2006年，WTO多哈回合谈判无限期中止，标志着WTO的自由贸易努力遭受重大挫折。金融危机后，美国发起了一些新的国际贸易协定与组织，旨在边缘化WTO。但是，WTO在发展中世界依然重要，发展中国家也在WTO中越来越占优势。

2. 南北关系中的问题

冷战期间，南北关系的问题就已存在；冷战之后，虽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水平有所提升，但这一问题仍未得到根本性的解决。冷战后，资本以前所未有的自由姿态在世界范围内流通，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就从中游走，在发展中国家投资；但是，跨国公司拿走了在发展中国家投资利润的绝大部分，其投资并未对发展中国家起到想象中那么大的作用；甚至，有一些跨国公司从事投机产业，在发展中国家大搞金融、房地产，其收益更难留在发展中国家。

发展中国家面对的贸易条件也鲜有实质性改观。多数发展中国家都是农业大国，但是发展中国家的农产品在国际市场上依然难以竞争过发达国家的农产品，因为发达国家有着高额的农业补贴，发展中国家的农产品没有价格优势。

我们知道，发展中国家要发展，资本是一个关键，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储备中处于弱势。发展中国家缺少制造高附加值工业品的能力，农业产品又竞争不过，因而缺乏硬通货。

总之，发展中国家难以发展，国际经济秩序是一个硬性的约束。怎样创造利于发展中国家发展的国际经济环境的问题，从二战后就已存在，至今也仍未过时。

第三讲 阿根廷

2025.3.20 / 2025.4.3

一、阿根廷概况

阿根廷共和国是一个位于南美洲的国家，面积278万平方公里，人口4604万（2022），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人口308万（2020）。人口中欧洲人和印第安-欧洲混血占95%，主要为意大利和西班牙人后裔；77%信奉天主教，9%信奉新教。

阿根廷有着优越的畜牧业发展条件，其自然资源也较为丰富，但这并未给阿根廷带来持久的繁荣。整个20世纪，阿根廷走的是一条“下坡路”，从一个相对富裕的国家变成了一个发展中国家。

二、阿根廷历史

（一）殖民者与考迪罗

16世纪中叶，西班牙逐渐在今阿根廷地域建立殖民地；1776年建立拉普拉塔总督区。1816年，殖民地宣布独立，建立拉普拉塔联合省；独立后陷入动荡，考迪罗之间互相攻伐。

在谈及南美近现代的发展进程时，绕不过的一个概念是“考迪罗”。考迪罗是大土地所有者，拥有大量的财富，同时拥有自己的武装，还拥有众多在其地产上工作的人口——可见，考迪罗所掌握的是一个政治、经济、军事联合体。讲师认为，考迪罗与中国东汉末期及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大土地主（诸侯、军阀）类似。

1853年，随着动荡逐渐平息，阿根廷制定宪法，确立了联邦制，经过几次修改，至今仍有效；这也为阿根廷地方力量较强的情况奠定了基础。1880年起，大量欧洲移民来到阿根廷，阿根廷政治经济进入稳定时期，由国家自治党（PAN）长期一党执政；国家自治党不是一个现代政党，而是一个代表考迪罗利益的统治团体。1912年颁布新选举法，给予年满18岁男性公民选举权；这标志着由国家自治党这一考迪罗统治团体独揽大权的时代即将过去。

（二）现代政党体制与军政府

1916年，激进党赢得选举；激进党即激进公民联盟，其主要代表中产阶级利益。1930年，军事政变推翻激进党政权。1945年，胡安·庇隆组建正义党，次年当选总统；庇隆是现代阿根廷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他的执政导致了阿根廷“庇隆主义”和“反庇隆主义”的出现，前者支持维护劳工权益、扩大社会福利，后者则反对这些主张。庇隆掌权至1955年被军事政变推翻；随后军人文人交替执政，但排斥了正义党。1973年，在民众运动压力下，正义党重新参选获胜，庇隆结束流亡回国任总统；1974年去世，其妻伊莎贝拉继任，1976年被军人政变推翻。

1976年至1983年，阿根廷被军政府统治，迫害镇压左翼反对派。1982年，阿根廷在马岛战争中战败；12月，十万人游行，军政府倒台；激进党阿方辛于1983年当选总统，结束军政府时代。1989年，正义党梅内姆当选总统，开启了阿根廷的自由化改革，为1999年至2001年的阿根廷金融危机埋下伏笔。1999年，激进党德鲁阿当选总统；2001年金融危机爆发后辞职，经动荡后，正义党杜阿尔德任总统。2003年后，正义党左翼的基什内尔夫妇相继当选总统。

2015年至2019年，中右翼联盟马克里任总统。2019年，左翼的全民阵线的费尔南德斯当选总统。2023年12月，极右翼“自由前进运动”米莱就任总统，其社会经济政策极端，裁撤大量社会福利支出。目前，参众两院第一大党为正义党等中左政党组成的“团结为祖国”。

纵观现代阿根廷历史，虽然有数次军政府政变，但其政局总体相对稳定，没有出现内战或局部分裂。

三、阿根廷基本政治制度

阿根廷是一个联邦制国家，由23个省和1个联邦区（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组成。

阿根廷实行两院制。参议院72席，全国24个省区各3席；参议员任期6年，每两年改选1/3；参议长由副总统兼任。众议院257席，由各省区按人口比例分配；众议员任期4年，每两年改选1/2；均由直选产生，可连选连任。

阿根廷总统是国家元首、政府首脑、武装部队统帅，直选产生，任期4年，可连选连任一次。

四、阿根廷的主要问题

（一）经济为什么在20世纪走入下滑通道

在19世纪90年代，阿根廷的人均收入与德国、比利时相近，高于澳大利亚、瑞典、瑞士、挪威等国。而在2001年，阿根廷有了1400万贫困人口，占了总人口的四分之一还多；其中赤贫人口550万。因此，我们要考虑的第一个问题是：阿根廷为何在20世纪从一个富裕的发达国家变为了一个发展中国家？

首先，我们考察19世纪与20世纪的世纪之交阿根廷经济繁荣的原因。当时，得益于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与地广人稀的人口情况，阿根廷的种植业、畜牧业发达，农产品大量出口。这一时期的欧洲处于科技革命、欧洲和平的最繁荣的时期，市场一片欣欣向荣，阿根廷通过向英国、欧洲的发达国家出口，换取了大量工业品。

一战后，阿根廷被迫进行进口替代。庇隆上台后，推行庇隆主义经济政策：国有化、继续进口替代、提高工人工资和福利。军政府基本延续了庇隆时期的经济政策。

80年代以后，阿根廷开始自由化改革，但并未解决原有的结构性问题。与同时期的其他自由化改革一样，阿根廷的自由化也是以私有化为基础的。由此就造成了诸多问题：储蓄率低，国内资本形成能力差，增长严重依赖外资；固定汇率和金融自由化导致本币币值高估，外来投机资金大量流入；对外贸易失衡，进口大大高于出口，逆差导致高额外债；私有化加剧了失业率、拉大贫富差距。

可见，以阿根廷为代表的一批发展中国家在推行自由化的过程中都忽视了，国际市场不是一个自由市场，而是有着各类结构性障碍（如发达国家对农业的补贴）的市场。另一方面，技术的发展使得不变资本在资本积累中的分量越来越高，而发展中国家依靠可变资本（如劳动力）的利润率持续走低，这对第二产业的资产所有者而言是致命的。由此，发展中国家的第二产业所有者就会投向第三产业（如金融），但金融资本的涌入又会为发展中国家带来巨大压力，最终导致金融危机。

2000年，阿根廷爆发金融危机，阿根廷经济在整个20世纪的积累几乎化为乌有。基什内尔夫妇任期内，借助世界范围内初级产品价格上升的一波趋势，阿根廷的经济状况开始缓和。但是，阿根廷经济的根本问题没有解决——出口问题。当前，阿根廷的农产品出口占50%以上，大豆为主要出口品；由过去的农业大地主形成的跨国金融集团成为了阿根廷财政的重要来源，没有进行土地改革的阿根廷的财政命运不掌握在自己手中，而掌握在国际垄断粮商手中。与此同时，阿根廷大多数人口为城市人口，但城市产业却无法满足这些人口的需求，产生了大量的失业人口与贫民窟。时至今日，阿根廷的财政赤字、通货膨胀问题仍然没有解决。

（二）是否形成了稳定的政治

阿根廷并未形成稳定的政治，剧烈的“左右摇摆”是其表现。阿根廷政治不稳定，主要是因为几种分裂。

1. 社会分裂

阿根廷的阶级和阶层可以分为三个：农牧业农场主和具有跨国联系的大资本家、中小企业主和城市资产阶级、劳工。其中，中小企业主和城市资产阶级从一战后进口替代时期发展起来，这一时期执政的激进党也代表了他们的利益；劳工阶层是在二战后影响力变大的。

阶层之间存在严重的对立。20世纪上半叶，主要是农牧业寡头与一般资产阶级的对立，前者对阿根廷本土工业的发展没有兴趣，乃至于压制后者；激进党上台后，一般资产阶级获益；直至1930年农牧业寡头支持的政变推翻了激进党统治。这一时期的另一组对立是农牧业寡头与劳工的对立——一战后，为了执行进口替代，农牧业寡头与一般资产阶级有时也会妥协，共同压制劳工阶层。

20世纪下半叶，主要的阶层对立变为了庇隆主义和反庇隆主义的对立。前者以社会福利、管制资本进出、国有化为特点，后者以节约开支、严格财政纪律、削减福利、自由化、放松资本管制为特点。

2. 政党分裂

阶层分裂与政党分裂相联系。虽然阿根廷历史上的国家自治党代表了农牧业寡头的利益，但其实农牧业寡头是不需要一个政党来代表自己的，因为不论是什么政党上台，都无法离开它们的财政支持。由此，阿根廷的政党分裂主要是激进党与正义党的分裂：激进党主要代表工业和城市资产阶级利益，正义党代表和利用劳工。这样一来，阿根廷虽然看似是一个“两党制”国家，但其实是一个“变形的两党制”——农牧业寡头集团是“房间里的大象”，而这在发达国家中往往是不存在的。

此外，这两个政党内部结构松散、派别林立。我们知道，考迪罗的妥协带来了联邦制的阿根廷，导致阿根廷建国后地方势力仍很强，这也就延续到了政党政治中。每一个阿根廷政党的省级组织都同时面临着党的中央组织与同级的其他省级组织；按照一个中央集权国家的传统，地方的党组织是要服从中央的党组织的；但在阿根廷，地方党组织首先考虑的往往是省组织周边的利益，而非服从中央。这一问题，不论是激进党还是正义党都没能解决。于是，阿根廷的执政党和主要反对党都主要是上述两党分裂组合形成的（现执政党除外）。

阿根廷政党的上述问题的另一个原因是庇护主义。在正义党执政时期，劳工背后有着工会；但是，在上世纪80年代阿根廷进口替代战略基本失败、失业人口大量出现后，失业人口无法在正规企业中工作，也自然无法加入工会，因而他们选择加入了另一种组织——贫民窟中的黑社会。这样一来，阿根廷的基层政治就受这些黑社会组织的领导者影响，政党动员选民不靠自己，而靠地方的“老大”，这也就是所谓的“庇护主义”。

由此可见，阿根廷的政党更多地只是一个选举的平台，而非一个完善的治理国家的政治组织。

阿根廷政党的如上态势导致了民粹主义。讲师认为，民粹主义政党与民众的关系是迎合民众，而非引领民众；民粹主义表面上是反精英的，但实际上却很容易出现精英统治。民粹主义政党追求着选民的选票，没有像一个现代政党那样忠于自己的党纲，更没有像一个列宁式政党那样成为人民的先锋队。民粹主义的问题在于，全盘迎合民众可能导致无法顾及长远利益，从而使问题的根本恶化。以正义党（“第三道路，民族主义，正义主义”）为代表的阿根廷的偏左政党就有突出的民粹主义特征。

（三）军队的角色

军队在阿根廷20世纪的历史上有着重要的角色。首先，这是因为考迪罗传统，旧阶层（农牧业寡头）与军队有密切关系。其次，军队拥有暴力、有组织，工会、黑社会的组织性都比不上军队；在政治分裂状态下，只有军队能代表国家。